

陈英士研究文集

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

十月一日至二十一日

湖州市陶英士研究会

湖州市陈英士研究会

目 录

陈英士研究文集

“英雄事业自堂堂”.....	姚 辉 (1)
湖州望族之一——吴兴陈氏.....	邵 钰 (36)
赢得身前身后名	
——记辛亥革命烈士陈英士.....	凌以安 (70)
从新发现的档案评陈英士的筹款活动.....	莫永明 (86)
陈英士和会党.....	邵 钰 (103)
陈英士与体育.....	韩锡曾 (114)
陈英士的上海住所.....	邵 钰 (123)
重修陈英士墓经过	邱鸿炘 (127)
柳亚子悼念陈英士的诗.....	徐重庆 (135)
辛亥革命时期的张静江与陈英士.....	张建智 (141)
郑孝胥与陈英士的一面缘.....	徐重庆 (176)
陈英士研究的回顾与综述.....	蔡一平 王增清 (179)

辛亥革命前后的姚勇忱·····	黄建祥 陈兴吾(211)
爱国实业家杨信之·····	徐重庆(217)
开国先贤杨谱笙先生传略·····	杨泰传(222)
武昌起义中的戴季陶及湖州人·····	余方德(223)
朱家骅和湖州的两所学校·····	嵇发根(230)
钱病鹤和《老猿百态》图·····	张志良(238)
湖州光复的前前后后 ·····	邱鸿炘(244)
编后记·····	(254)

“英雄事业自堂堂”

姚 辉

陈其美字英士，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他一生为孙中山开创的民主共和事业顽强奋斗，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赞誉。但国内史学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他持否定的态度。直到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才突破了相袭的偏见，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再审视、重评估，一批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也就为今天在其故乡进行纪念陈英士学术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思想基础。

陈英士的一生只活了38岁。从他1906年参加同盟会到1916年殉难。只有10年。在这10年中，他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作为同盟会时期的骨干，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反对封建专制，谋求中国独立、民主、富强的事业，披荆斩棘，扶颠持危，影响巨大，其好友于右任曾以凝炼的诗句，概括其一生：“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河山吊国殇。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①我们今天纪念他，对先辈在开辟中国近代化的事业中，对用鲜血积淀的历史经验中，对他的爱国革命精神，进行探索、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笔者拟就陈英士一生业绩,按时间顺序,概述如下:

一、陈英士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基于“重振国威,洗雪国耻”的爱国愿望,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其一生政治生涯光辉的起点。

1905年,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它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以后,在《民报》发刊词中,概括成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理论,以指导实践活动。同盟会纲领适应了革命者推翻清朝政府以救亡图存的愿望,以恢复中华和创立民国为目标,为新兴知识界指出了为一个为近代化而奋斗的蓝图。极具吸引力的纲领,使在日本留学界掀起了加入同盟会的热潮,正是在同盟会获得大发展的1906年冬,陈英士参加同盟会,走上了反清革命、誓建共和的革命之路。

陈英士参加同盟会,是他爱国思想在接受新思潮后,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陈英士,浙江湖州人。清光绪三年12月15日(公元1878年1月17日)生于湖州府城内五昌里。出身于商人之家。7岁到14岁,在家塾启蒙课读。15岁时其父病故,家境中落,经亲戚介绍,到崇德县石门镇(今桐乡市崇福镇)善长当铺做学徒。在那里生活了近13年。这时,正值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时期。当他18岁时,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24岁时,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占京、津战争。石门和上海有定期的火轮和航船相通,他阅读上海的报纸,“洞悉世界大事和中国

国情”，就“驰书亲友，痛言清廷失政，须人民自图振作，二十年后重振国威，洗雪国耻”。^②1902年，其弟陈其采从日本学成归国，给他带来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崛起而为亚洲强国的信息，他“以内地见闻囿隘，决易地改业，以扩新知”。^③1903年春，陈英士到了上海，生活了三年，又感到在上海“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④于是，在弟弟和同乡、世交杨信之、朱午桥（后为陈果夫岳父）的资助下，于1906年夏东渡日本留学。陈英士在日本东京，先是进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次年进东斌学堂，习军事学。“这两个学校都是由孙中山先生筹措经费，而请日人士尾亨博士出面创办，旨在秘密训练革命干部。（陈）从此就在总理（孙中山）直接领导下，研习革命的理论 and 军事学术。这一年冬天，他加入了革命同盟会。”^⑤

陈英士参加同盟会年已30岁，其人生观、价值观已形成。他执著地追求实现“重振国威，洗雪国耻”的愿望，在同盟会的旗帜下，从爱国走向革命，使其思想跃进一个新境界。陈曾说过：“其美一书生耳，夙惧中国危亡，迫于呼吸，非从根本解决，立宪前途必归泡影。不得已而出于破坏，薪胆数年，稍稍就绪。”^⑥这应该是可信的。

陈英士投身革命颇具个性特色。他参加同盟会似乎没有同时代维新派、立宪派那样复杂的心路历程，对传统势力没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对革命也没有从思想深处的悲惧不安，少了一层传统因袭的包袱，有一定的自觉意识。陈参加同盟会前也不是“老革命”，他和华兴会、兴中

会、光复会没有历史的渊源关系，他在东京虽然结识过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秋瑾、徐锡麟等著名革命党人，也只是一般交往，很难说有多大影响。倒是应注意的，陈英士从东京开始，深相结纳了一批江浙籍的同盟会员，其中如黄郛、周淡游、周日宣、庄子盘、周骏彦、邵元冲、蒋志清等，他们当时只是一批寻求出路有待发展的人才，当时也很难说有多大的政治野心。但这批人，在以后的历史中，形成了以陈英士为核心的群体，有相当的能量，对研究陈英士，研究民国史均是值得注意需深入探索的。可惜的是，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史往往对此忽视，甚者敌视，从这里开始，形成了陈英士历史评价中的分歧。

二、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英士经营沪上，开创新局，为迎接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1908年春，陈英士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开始并不顺利，但他很有毅力，常说：“机会不能从期待中得来，应该从创造中得来；即使我们本身不能成功，亦得创造一个大潮流，把中国引上进化之路，”^⑦经过一年奔波，到1909年春，陈决意在上海打开局面，再经过了二年多的刻苦经营，奋力开拓，陈英士终于成为蜚声沪上的著名党人。

一是重振同盟会在上海的活动。

同盟会建立的次月，就筹建了同盟会上海分会。到1907年夏，徐锡麟、秋瑾皖浙起事失败，“清吏照会沪租界当局大索党人，人心为之汹汹，诸同志多他适避之”。

“自是丁未(1907)至庚戌之三、四年间,同盟会在上海之党务几完全停顿,长江沿岸各省之革命工作亦无所进展。其后陈其美出而重振旗鼓,始自空言而渐进于实行,而党势为之一振焉。”^⑧

陈英士在上海活动时,同盟会正处于艰难困苦阶段。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同盟会领导层由意见分歧发展到组织分裂;党人有的牺牲,有的颓唐,有的出走,有的叛变。在革命退潮情势下,长兄陈其美来信,劝他“自审度,毋冒险,贻亲忧”。陈复信:“弟所图乃国事。同志之以身殉职已不乏人,弟何忍中途自弃厥职,以负国负友耶!”坚持同盟会的秘密活动,并筹备建立中部同盟会。

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陈英士等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陈英士掌庶务,另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设立分会,直接受上海总机关管辖,把上海和长江流域的革命势力联结起来,形成了江南革命活动的中枢,酝酿掀起新的革命形势。

关于中部同盟会的性质,有的认为,“这个组织虽然号称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从它发表的宣言来看,实际上是因为对同盟会的领导有些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⑨国外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认识,“有几位会员在1910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一个机构以指导长江一带的活动。”^⑩这个新机构就是指同盟会中部总会。这

些看法值得重新研究。笔者认为中部同盟会应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卓有成绩的分支机构,它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一,从建立的原因来看,它是针对同盟会领导失控、组织涣散,南方军事起义频频失利的情势下,经过长期酝酿而创立的。在《成立宣言》中指出,“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指黄花岗殉难诸烈士),各有奋心,冀与举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以气郁身死(指赵声),一以事败心灰(指黄兴),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指胡汉民),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诸汪洋泡影中矣。……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己,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所以,它的建立,是重振同盟会的举措。其二,在组织体系上,宣言明确指出:“定名为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它是同盟会原拟要设的中部支部计划的实施,“作为规画长江党务之中枢”,和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①它即不是“独立行动”,也不是“脱离孙中山”的“单独行动”。其三,在活动策略上,“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的方针,以上海为总机关,“由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联合大举,各自分途进行,而统属于中部同盟会”。^②这是一个力图复苏革命推向长江中下游的大计划,它在实践上弥补了同盟会侧重经营华南的偏颇。其四,孙中山、黄兴对中部同盟会是认可的。中部同盟会建立后,陈英士等先后收到了黄兴六封信,均表赞许,其中10月3日的信中说:“欣悉列公热

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及！迨者蜀中风云激发（指四川保路风潮），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③孙中山对于中部同盟会的活动也予以赞许和首肯。中部同盟会成立后，由于宋教仁、谭人凤经常在外地活动，在上海实际上由陈英士主持。通过了陈的悉心经营，“会务益振”，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设立了总机关，宝昌路十五号为秘制炸弹处，嵩山路十一号为隐藏军火处，打铁浜四十五号、后马路湖州旅馆、万安旅馆等处为招待所，《民立报》社为联络点，自此革命情绪日益高涨。

二是“联络商团，媾通士绅”，导致士绅势力和革命联盟。

上海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本世纪初以来，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日益显示了它的阶级力量，1904年，成立了足以号召全国商界的上海商务总会，1910年成立的上海城厢自治公所，已是管理地方的准政机构，1911年4月成立的全国商团联合会，并组建了一支武装，同年6月建立了国民总会，资产阶级士绅势力实际上已左右了租界外上海的局势。

在大动荡、大分化的年代，陈英士利用时机，采取了联络商团，媾通士绅的方针，发展了同盟会在上海的新势力。上海金融界，实业界、商界的大亨巨擘，均是有经济实力、有政治能量的人物，他们之间通过各种团体形成网

络,以反映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历来是清政权统治的社会基础。由于清政府在“预备仿行宪政”的活动中,对积极要求实施宪政的立宪派人士,采取敷衍、拖宕、冷遇的态度,使得士绅阶层中的部分人,日渐与清政府疏离,转而联络革命。

陈英士在结识、联络士绅方面,可谓得心应手,应对裕如。他长期从商,熟悉商界,不乏沟通的共同语言;他凭借湖州籍、宁波籍的社会关系,加上他灵活的公关手腕,逐步取得信任,其中沈缦云、王一亭是他最早结纳的“新同志”。沈缦云名懋昭,江苏无锡人,上海信成银行协理,他曾在1910年作为上海总商会代表,参加了赴京立宪请愿活动,“既入京师,睹朝政腐败,不可挽救,始倾向于改革”。^⑭王一亭名震,号白龙山人,是陈其美同乡,原为日清轮船公司买办,后投资于民族资本企业,在金融、面粉、地产、保险事业中,拥有巨资,是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上层人物,又是江浙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通过同乡和长子王孟南的关系,“民元前二年结识陈其美,民元前一年参预中部同盟会活动”。^⑮另外,在上海的商界闻人,如虞洽卿、叶惠钧、顾馨一、李云书、李厚祁、李厚禧等,均在1910年和1911年间成为中部同盟会员。只一些社会名流、商界闻人,诸如李平书、莫锡纶、朱葆三、穆湘瑶等,通过沈缦云的牵线搭桥,联络感情,结为莫逆,推动他们赞助革命。陈英士也因此,控制了商会,自治公所,商团和国民总会的活动。

三是注重舆论，为宣传革命服务。陈在上海，先后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为宣传革命机关”，后又协助于右任办《民立报》，中部同盟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为中部同盟会的机关报，它既是言论机关，又是联络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

四是联络会党，成为陈英士在上海的特殊环境中，从事秘密活动的助力。陈素以四捷——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著称，平生以“冒险为天职”。他通过活动，掌握了帮会势力。如会党头目刘福彪，通过张承樛和他们联络感情，“杀雄鸡、喝血酒、歃血为盟，立下字据为兄弟”，使刘福彪表示，“共同生死，驱逐满奴，复兴汉业，以敢死之志，抱必死之念，以报国家”，从而将刘的手下三千多人成为光复上海时的突击力量。^⑩又如大流氓应桂馨（即应夔臣），原是浙江鄞县的暴发户，因为打官司吃了亏，和陈其美结识。陈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很大，当时“上海的戏院里，茶馆、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革命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作台柱子。”^⑪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英士在上海，确实开辟了一个同盟会的新局面。他以上海中部同盟会为“长江党务中枢”，联络江浙以及长江流域各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成功，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改变了同盟会的华南屡屡挫败局处一隅的被动局面。他适合上海市情，形成了以

中部同盟会为核心,利用上海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能量作支柱,利用会党为助力,这样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陈英士以上海为据点,为同盟会在长江下游立下了一方基地,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作了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对此,孙中山作了很高的评述,赞陈“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垂十余载,期间慷慨持义,联缀豪俊,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归同志类能称述。”有的专著定位陈为“流氓政客”,是“买办阶级的代理人”,其活动也成为“流氓政治”,全盘否定陈在上海的革命业绩,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不实之调。

三、在辛亥革命时期,陈英士起义上海,底定东南,赞赏共和,有功民国;但排挤光复会,做了亲痛仇快的千古憾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3号上海各报公布了,全城沸腾。陈其美敏锐地觉察到,中部同盟会为之奋斗的目标将成为现实,于是日夜谋划于密室,频频奔赴于宁、杭,力图把武昌起义燃起的烽火,蔓延成长江下游的革命高潮。此时,陈其美做了以下的几件大动作。

一是确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起义部署,底定东南,援解武汉危局。

武汉起义后,清廷采取的头一个应急步骤,就是启用袁世凯,将北洋劲旅南调武汉,妄图扑灭革命。武汉危急。黄兴、宋教仁和湖北革命党人屡屡给陈来信、来人,催促尽快起义,以解武汉之危。陈其美曾亲赴杭州,南京,当他

了解到两地起义确有困难，而武汉又危在旦夕时，11月1日，陈与李平书、钮永建等在上海自治公所密议，断然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2日，汉口失守。3日，上海起义打响了。

上海起义前夕，在政治力量对比上，革命势力已占有优势。民众对武昌起义一片拥护之声。同盟会和光复会团结协作。同盟会方面，掌握了商团、会堂等共8千人以上的武装力量，又瓦解了由梁敦淦控制的、清廷在上海的主力五个巡防营，暂驻吴淞的过境部队黎天才部表示“同情义举”。光复会方面，李燮和在吴淞组织了一支500人的敢死队，尹锐志策反清廷武装也在有成效，清廷在上海的大部分武装，均表示了支持革命或观望态度。起义前一天，陈其美与李燮和在“民立报”社会晤，表示双方合作，史实记载：“担任上海光复之任务者二人，陈其美与李燮和是也”。^⑭

光复上海是公然进行的。11月3日上午9时，起义首领们在斜桥西园上海总商会广场集合，简直似一个盛大的节日，“一队一队商团开来，洋装革履，弹械精良，步伐整齐。队伍排列好后，即有人登台演说，宣布独立，扯下了清朝龙旗，升起了同盟会制定的青天白日旗。一时欢声雷动，经久不息。商团分道出发，负责维持街道治安。”^⑮上午11时，民军光复闸北。午后4时，占领上海县城。在攻打制造局时，陈其美曾组织了二次进攻，未克，入内劝降被拘。李平书、王一亭、沈缙云、李燮和等急调商团、巡

警、民军漏夜攻打，于次日凌晨4时攻克。4日，上海光复。

上海光复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了杭州。此前，上海同盟会和光复会均派了敢死队支援杭州。4日晚，杭州的新军两标(团)发动起义，攻下了抚署，俘巡抚增韫，旋成立浙江军政府，举立宪派名流汤寿潜为都督。

上海光复，也震动苏州。上海赴苏州的革命党人加紧了活动，在逼人形势下，江苏巡抚程德全于5日宣布独立，在抚署衙门前挂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新招牌。7日，镇江光复。革命党人加速了夺取南京的部署。当时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把原驻防浦口的张勋巡防营调驻城内，负隅顽抗。陈其美和江浙军政府筹商，组织苏浙联军，请徐绍桢出任总司令，会攻江宁，并在上海设总兵站。陈其美发布了《檄南京文》，历拆清廷封建专制的种种罪行，坚定表示“诛锄野蛮之满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国家”的严正立场。苏浙联军经过激战，在汉口失守一星期后的12月2日，攻克江宁。上海光复，东南底定，成为辛亥革命继武昌起义后又一重大转折。孙中山表彰陈其美说：“武昌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之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

者，较他着尤多也。”^①

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同盟会员为主体的地方革命政权——沪军都督府。

上海光复后，6号下午各团体代表在小东门海防厅开会，11月7日成立沪军都督府。据《民立报》发布关于成立沪军都督府的消息云：“昨日下午，本埠推举要职。众以上海为交通大埠，应另行举一沪军都督，招集大队雄军北进，以定国是，并为我东南门户之备，业已公举陈英士为沪军都督。因陈君于此最为出力，经营惨淡，出入险地，力任劳瘁，众士归心故。”上海各报均发布了陈就沪军都督职通告。沪军都督府下设司令、参谋、军务三部，陈兼任司令部长，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李显谟任正副军务部长。上述三部“均直辖于都督，受都督之指挥司令，执行主管事务”。都督府还配置有外交总长伍廷芳，民政总长李平书，财政总长沈缙云，交通部长王一亭，海军部长毛仲芳。上述人选，伍廷芳、李平书是赞成共和的社会名流，其余都是同盟会员。这是一个由同盟会为主体的地方权力机构。

关于沪军都督府的设置问题，始终存在着争执和斗争。其焦点有三。一是上海的立宪派认为，没有必要设立沪军都督府。1911年11月，沪军都督府成立的当月，上海立宪派名流唐文治，赵凤昌等十三人联名向陈其美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拟请从长计

议。”精明的陈其美当然懂得话中之奥秘，他回答得很机智，“其美于上海光复之初，被众推举为沪军都督。夫上海属隶江苏，地居县治，都督之称，何以副实，当时曾力驳固辞。而众意以为都督之设，非原官制，非关地域，但由革命事实而发生特此设之官。且以战事方新，急宜策应，得藉此沪滨一隅为海陆交通要塞地，军需饷械所自出，以扶大局，以系人心。”^②也就是说，沪军都督府的设立，非关清政府的政治体制，而出于革命实际的需要，这样，就义正词严地堵住了立宪派背后的图谋。二是陈英士任都督的合法性问题。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陈英士“窃取”或“篡夺”。当今有的专著也认为是“攫夺”。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人物是很复杂的。有些城市中的流氓头子也是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假革命。在上海……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用这种挂着革命招牌的流氓政客做他们的代理人，乘着革命的浪潮，攫夺了权力。”这些论断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把陈其美说成是“流氓政客”的假革命党，缺乏依据。尽管陈其美生前和死后，有敌人的攻讦，也有同志间的批评，但光复上海，是反清革命的重大行动，为同盟会中人所赞誉，为孙中山所论定；其二，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出于海防厅各界代表集会的推举，合乎产生的顺序；其三，陈英士经营上海三年的业绩，光复上海的表现，也是非陈莫属。据此，陈任都督是合法的符合同盟会要求的革命举措。三是陈任都督，所以引起轩然大波，究其实质，系同盟会应否掌握权的问题。从陈英士领导沪军都督府，在实践